

比较政治学前沿

Frontie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o.3



第 3 辑

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一项对主要学术期刊的分析

杰拉多·蒙克 理查德·斯奈德

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

詹姆斯·马洪尼

比较的必要性——量化政治学中的理论证实

加文·克拉克

政治科学中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加里·金 罗伯特·基欧汉 西德尼·维巴

两种文化的故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詹姆斯·马洪尼 加里·格尔茨

测量的效度——质性与量化研究的共同标准

罗伯特·阿德库克 戴维·科利尔

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

| 主编 高奇琦 | 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1 比较政治学导论	1
1.2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	10
1.3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15
1.4 比较政治学的意义	20
1.5 比较政治学的挑战	25
1.6 比较政治学的未来	30
1.7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5
1.8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0
1.9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5
1.10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50
1.11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55
1.12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60
1.13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65
1.14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70
1.15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75
1.16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80
1.17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85
1.18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90
1.19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95
1.20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00
1.21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05
1.22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10
1.23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15
1.24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20
1.25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25
1.26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30
1.27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35
1.28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40
1.29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45
1.30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50
1.31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55
1.32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60
1.33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65
1.34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70
1.35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75
1.36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80
1.37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185
1.38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190
1.39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195
1.40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00
1.41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05
1.42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10
1.43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15
1.44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20
1.45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25
1.46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30
1.47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35
1.48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40
1.49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45
1.50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50
1.51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55
1.52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60
1.53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65
1.54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70
1.55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75
1.56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80
1.57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285
1.58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290
1.59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295
1.60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00
1.61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05
1.62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10
1.63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15
1.64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20
1.65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25
1.66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30
1.67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35
1.68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40
1.69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45
1.70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50
1.71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55
1.72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60
1.73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65
1.74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70
1.75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75
1.76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80
1.77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385
1.78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390
1.79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395
1.80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00
1.81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05
1.82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10
1.83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15
1.84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20
1.85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25
1.86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30
1.87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35
1.88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40
1.89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45
1.90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50
1.91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55
1.92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60
1.93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65
1.94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70
1.95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75
1.96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80
1.97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485
1.98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	490
1.99 比较政治学的实践	495
1.100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500

比较政治学的感性与理性之争

199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2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14AZD133）

比较政治学前沿

Frontie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o.3



第 3 辑



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

| 主编 高奇琦 | 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3辑):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 / 高奇琦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17-2613-1

I. ①比…

II. ①高…

III. ①比较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921号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3辑):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张娟 王琳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94千字

印张:20.5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网址:www.cctphome.com

邮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比较政治学前沿 (学术辑刊)

主 编：高奇琦

学术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 | | |
|-------------|------------|
| R. Benjamin | (明尼苏达大学) |
| 蔡 拓 | (中国政法大学) |
| 曹泳鑫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 常士阔 | (天津师范大学) |
| 陈明明 | (复旦大学) |
| 陈志敏 | (复旦大学) |
| 陈周旺 | (复旦大学) |
| 程同顺 | (南开大学) |
| 程竹汝 | (上海市委党校) |
| 储建国 | (武汉大学) |
| 高奇琦 | (华东政法大学) |
| 耿 曙 | (上海财经大学) |
| 郭定平 | (复旦大学) |
| 何俊志 | (复旦大学) |
| 胡 伟 | (上海交通大学) |
| 黄卫平 | (深圳大学) |
| 景跃进 | (清华大学) |
| 刘建军 | (复旦大学) |
| G. Munck |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
| 彭 勃 | (上海交通大学) |

- C. Ragin (加利福尼亚大学爱尔文分校)
桑玉成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苏长和 (复旦大学)
谭君久 (武汉大学)
佟德志 (天津师范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湘林 (北京大学)
徐以骅 (复旦大学)
肖逸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杨海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叶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俞正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袁峰 (上海市委党校)
曾峻 (上海市委党校)
张小劲 (清华大学)
周平 (云南大学)
周淑真 (中国人民大学)
朱天飏 (北京大学)

编辑部成员

(按音序排列)

杜欢 郝诗楠 吉磊 阙天舒 王金良
汪仕凯 邢瑞磊 严行健 游腾飞 章远

《比较政治学前沿》序言

在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日益发展成为一门基础性的二级学科，并且有力地推动着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日益完善与前沿领域的不断拓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比较政治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而且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① 在这种情况下，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编辑的《比较政治学前沿》系列辑刊应运而生。本辑刊创办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知识引进来促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毋庸讳言，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才真正得以起步，而国际学术界对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并且引领着这一学科的前沿发展。因此，对于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便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学术任务。《比较政治学前沿》的初期定位，便是将国外有关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的经典文献译到中文世界中来，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和学科基础。而华东政法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也能够以本辑刊为平台，汇聚国内外比较政治研究的精华，创造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① 杨光斌：“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9日。

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简称“华政”）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之一。1952年，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长期以来，法学一直是华政的传统优势学科。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自更名以来，华政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特色大学。因此，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在法学之外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而政治学则是华政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突破的新兴学科。

政治学在华东政法大学是一门具有历史渊源的年轻学科。如前所述，华政在创立伊始便合并了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政治系，而这些院校的政治系是当时华东地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力量。圣约翰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和“外交人才的养成所”^①，在这座优美的校园中，曾经建立起国内较早和较完整的政治学学科，并培养出邹韬奋、顾维钧、施肇基、荣毅仁、李慎之、陈鲁直等一批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虽然经历了坎坷的历史过程，但是华政政治学发展的火种却一直传承，并未熄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华政逐渐恢复了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华政的政治学学科发展迅速，且已颇具规模。

华东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作为“大法学”下的姊妹学科，法学和政治学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也都是“政法”院校的重要基础学科。单从具体的子学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学理论与宪法学、行政学与行政法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法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互融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政的法学与政治学学科间可以实现相互给养，也就是说，传统的法学优势可以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支撑，而政治学学科的完善也

^① 张仲礼：“序”，载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会为法学学科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支持。因此，就长远发展而言，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强和推进政治学学科的建设。

在上述观念的指导和支持下，华政的政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5年，华政获批上海市首批政治学教育高地；2007年，政治学开始作为校级重点学科进行建设；2008年，成立政治学研究院。此后，政治学研究院一直以比较政治学为中心推进学科发展，并汇集了一批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人才。研究院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在2010年举办了国内第一场以“比较政治学”为关键词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辑刊等。可以说，政治学研究院为华政政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由于相关人事变动，政治学研究院更名为政治学研究所，虽然机构有所变化，但基本的研究队伍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特色得以延续，并有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比较政治学前沿》正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现在的政治学研究所由一支年轻的研究团队组成，从这个团队身上，我看到了学术的激情和华政政治学的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政治学研究所已经围绕比较政治研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建设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学的数据库网站，在国内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我希望《比较政治学前沿》能够延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严谨的学术翻译和经典引介，顺应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前沿的理论与方法，也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谨此为序，与学界同仁共勉。

何勤华

2012年8月28日

于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3辑编译说明

国外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倾向于认为，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用方法来界定其边界的学科。譬如，萨托利指出：“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①阿伦·利帕特也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②既然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政治学如此重要，那么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就应该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心之一。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还基本上处在非自觉地使用研究方法的阶段，而且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比较少。^③因此，本期《比较政

*本序言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①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 3, 1991, p. 243.

②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 682.

③ 张小劲和景跃进在《比较政治学导论》的第四章中讨论了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法和操作技术等问题。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113页。李路曲近年来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较深入的讨论。参见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李路曲：《从对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李路曲：《个案比较与变量比较方法在制度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载《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尽管如此，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成果也还是比较少的。

治学前沿》依旧延续了前几辑强调比较方法的风格，进一步聚焦于一些关于比较政治学中质性和量化方法讨论的文献。

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将尝试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梳理。^① 通过文献梳理，我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目前国外的比较政治研究中，质性方法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在比较政治的质性方法方面，国外学术界有哪些进展？下文首先会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学术史进行整理，然后从质性和量化的二元视角出发对这段方法史进行评述，最后再对质性方法的一些新进展以及新趋势进行总体性评述。

一、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国外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② 在6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并且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 Kallberg）在1966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比较的逻辑：对政治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评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在1968年《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创刊号上分别发表的《比较方法的未来

① 我们在这里采用了“质性方法”的译法。在国内的翻译中，有三种译法：一种是“定性研究”。早期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习惯使用这一译法。第二种是“质的研究”。以陈向明为代表的教育学领域学者在早期研究时喜欢用这一译法。第三种是“质性研究”。应该说，目前“质性研究”这一译法更为通行。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万卷方法”丛书（目前已经出版80余本）中，最早出版的诺曼·邓津主编的《定性研究手册》仍用定性研究的译法，但后期出版的涉及该译名的近10本书都使用了质性研究的表述。包括陈向明主编的《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一书。考虑到这一趋势，我们选用了质性研究这一译法。

② 美国是推进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要国家。而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方面，美国学者几乎完全主导了这一过程。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更为偏重科学的部分，而这种科学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特色。相比而言，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偏重哲学思辨。

和比较方法与英国政治的研究》等论文。^①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对比较政治方法的简要评述，并且对后续研究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笔者将这些成果的出现看成是第一次浪潮的前潮。高潮真正出现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萨托利于1970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实质性内容的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扩展。这种范围的扩展引发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看起来是在进行一些比较研究的努力，但是却缺乏比较方法（例如在方法论的自觉和逻辑技巧上都是很缺乏的）。”^②鉴于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缺失，萨托利从理论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元素入手，分析了概念构成和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等问题。利帕特在1971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是比较方法史上另一篇开创性的文献。在这篇文献中，利帕特对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较为清楚的界定，对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以及案例分析之间的异同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并且对比较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③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在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研究的逻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比较政治方法研究著作。在此书中，普沃斯基和图纳在密尔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和“最具差异

① Arthur L. Kallberg, “The Logic of Comparison: A Methodological Not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 19, 1966, pp. 69 – 82; Harold Lasswell, “The Futur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No. 1, 1968, pp. 3 – 18; Samuel Be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British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No. 1, 1968, pp. 19 – 36.

②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52.

③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 – 693.

性系统” (most different system) 的比较研究设计。^① 求同法和求异法在研究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 而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方法则通过放宽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这三篇文献是第一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成果。

之后的一些成果可以看成是这次浪潮的继续。^② 这一浪潮的余波甚至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在1991年《理论政治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上发表的“比较与错误比较”一文中, 萨托利对比较政治方法二十多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萨托利振聋发聩地指出,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 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多数研究者对“比较什么”以及“如何比较”这类问题仍缺乏足够的思考。一些诸如“猫—狗组合”(指本来不存在的组合) 之类的作品充斥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③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作品是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 的《比较政治: 理论与方法》。^④ 这本书是对比较政治方法二十多年发展的一个完整总结。另外, 最近的一些成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波浪潮的回潮。譬如, 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 和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 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 萨托利的传统》一书, 集结了萨托利在比较政治方法方面的研究和一些受到萨托利影响的、关于概念研究的新方法论成果。^⑤

第二次浪潮的前潮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前潮的代表性成果是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 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 在质性

①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1970, pp. 31 - 35.

② 例如, 利帕特和图纳的两篇论文: 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ble - 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Vol. 8, No. 2, 1975, pp. 158 - 177; Henry Teune, “Comparative Research,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Vol. 8, No. 2, 1975, pp. 195 - 199.

③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 3, 1991, pp. 243 - 257.

④ Guy Peters,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and Method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⑤ David Collier and John Gerring, eds., *Concepts and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和量化策略之外》一书。在这本书中，拉金明确界定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的分野，并且尝试将布尔代数等一些新方法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之中。^① 第二次浪潮来临的标志性事件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社会研究设计：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的发表。在这部书中，作者指出，“好的量化研究和好的质性研究的逻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的差别。……我们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希望鼓励质性研究者认真对待科学推理（scientific inference）并把这一点整合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希望，这种一致的推理逻辑以及我们展示这种逻辑的努力（以证明这种逻辑可以对质性研究者有用），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以帮助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② 简言之，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希望把科学推理作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共同的逻辑，并以此来沟通两种路径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之后激起了一系列关于它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组评论文章。^③ 之后，有两本重要著作都是以《社会研究设计》为对话蓝本出现的。一本是亨利·布拉迪（Henry E. Brady）和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主编的《重新思考社会研究：多元工具与共享标准》，^④ 另一本是拉金所著的《重新设计社会研究：模糊集合及其他》。^⑤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三

①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②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viii.

③ David D. Laitin, 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 1995, pp. 454 - 456; James A. Caporaso, "Research Design, Falsification, and the Qualitative - Quantitative Div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 1995, pp. 457 - 460; David Collier, "Translat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The Case of Selection Bia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 1995, pp. 461 - 466; Ronald Rogowski, "The Role of Theory and Anomaly in Social - Scientific Infer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 1995, pp. 467 - 470.

④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⑤ Charles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KKV”成为这一研究的标识。“KKV”的研究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所评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社会研究设计》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推动了政治科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觉，而且这一遗产完全可以看成是有益的。”^①

这一浪潮的高峰是《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在2007年第1期和第2期上的讨论。2007年第1期是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向”的一个专辑。杰拉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发表的《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一项对主要学术期刊的分析》是这一专辑的核心论文。蒙克和斯奈德对《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和《世界政治》这三个杂志在1989到2004年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质性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明显占据主导。^②对于这种质性占据主导的情况，蒙克和斯奈德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消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之间的对立，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二是使用更多量化的数据分析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③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对于蒙克和斯奈德研究的批评性成果。在第一

① James Mahoney, “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120 - 121. 马洪尼指出，“它（KKV的研究）使得诸多方法论的名词和观念——描述性推理（descriptive inference）和原因性推理（causal inference）、可观察的暗示（observable implications）、单元同质性（unit homogeneity）、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平均因果效应（mean causal effect）等变得流行。并且，它对研究设计中每一步骤的系统化——从形成问题、到产生可检验的理论、到选择具体的观察、到检验理论、再到汇报结果——激发了关于方法论的每一个方面的讨论。”

② 蒙克和斯奈德的统计数字是，纯粹质性分析的占44.3%，质性主导的综合方法占19.0%，量化主导的综合方法占13.1%，纯粹的量化分析占23.6%。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 12.

③ 在文末，蒙克和斯奈德给出5个方面的建议：一、使用与生成理论时所依据数据完全不同的数据来检验假设；二、使用数据来检验那些与核心概念紧密联系的理论；三、形成那些在因果模式中表明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四、对所有变量和单元进行赋值并进行数据分析；五、通过大样本的观察来评估理论。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 26. 这五个建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量化方法的重要性。

篇评述文章中，马洪尼认为前两位作者选取的样本不够完整，所以他增加了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中同时期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的数据分析。在分析之后，马洪尼得出结论，目前的比较政治研究还是更多地表现为量化的特征，^① 而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加强对案例本身的样本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② 在第二篇评述文章中，埃里克·维拜尔斯（Erik Wibbels）指出，蒙克和斯奈德的研究低估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裂，即在那些坚持“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规则”（basic methodological rules of social science）的学者和不坚持这些规则的学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维拜尔斯认为，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问题不是应该偏向质性研究还是偏向量化研究，而是目前许多研究都完全缺乏基本的比较研究方法。^③ 在这篇文章之后，蒙克和斯奈德对前述的批评做了简要的回应。两位作者认为，马洪尼长期关注质性研究，并且在这一领域有非常出色的成绩，所以他会特别强调质性研究对未来比较政治分析的意义。而对于维拜尔斯的评论，蒙克和斯奈德表示了部分赞同，但两位作者同时也指出，仅仅强调方法论者与无方法者的冲突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把那些对相同领域的实际问题共享着同一种激情但却使用不

① 马洪尼发现，在这新选择的三本杂志的169篇论文中，质性分析所占比例仅为8%。在这三本杂志中，《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了绝大多数的质性分析论文，而这本杂志发表的其他比较政治论文的90%却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James Manoney, “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 32. 马洪尼还进一步分析道，在蒙克和斯奈德选择的三本杂志中，质性比较研究论文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衡的。《比较政治》发表了绝大多数的质性研究成果，而《世界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则更多体现出对两种研究方法的平衡。而且，《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数量化的趋势。James Manoney, “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 35.

② James Manoney, “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p. 35–37.

③ 维拜尔茨指出，绝大多数的地区研究都是描述性的且缺乏原因分析，而多数所谓的质性研究则看起来缺乏科学性。Erik Wibbels, “No Method to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Madne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p. 41–43.

同方法论技巧的学者整合在一起”。^①

在《比较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上，一个关于政治科学各领域中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的讨论以专辑的形式出现。马洪尼的“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是这一专辑中最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马洪尼讨论了目前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一些前沿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方面，马洪尼对质性研究在如何产生新假设，如何进行概念创新以及如何确定同质案例的样本群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在理论检验方面，马洪尼对样本内方法和跨样本方法等理论验证方法进行了讨论。样本内方法主要包括探寻中介性机制和对理论的多种可观察性暗示进行验证等，而跨样本方法则主要包括一组对假设的必要和充分原因进行评估的技术等等。在最后，马洪尼就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的独特意义和贡献进行了探讨。^②另外两篇论文是质性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的研究。^③在最后的总评性文章中，杰克·莱维（Jack Levy）指出，虽然前述的三个领域都出现了质性研究的新进展，但是相比而言，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质性方法的运用比美国政治研究中更为深入。莱维进一步指出，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区别可能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著，而未来政治科学的研究则需要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cross-method dialogue）。^④

① Gerardo L. Munck, Richard Snyder, “Vis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ply to Mahoney and Wibbe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07, p. 47.

② James Mahoney,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 122 - 144.

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美国政治研究不是比较政治研究。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 145 - 169; 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Case Study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fie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 170 - 195.

④ Jack Levy,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 - 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 196 - 214.